

中国式现代化演进中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路径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100009)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促进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把全面性与重点性统一起来,既推进重点,又着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从人的现代化发展出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产业体系现代化演进中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在构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程中夯实农业基础,在发展虚拟经济时发挥其服务作用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在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固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促进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路径。动态地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演进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全面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是中国成为韧性强的经济体、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互促进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支点和优势。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经济社会协调;产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2)06-0003-11

DOI:10.19639/j.cnki.issn1003-5230.2022.0063

党的二十大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大决策部署。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包括协调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1]。2022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

收稿日期:2022-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工农关系政策演变研究”(21AZD10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百年道路、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2021mgczd009)

作者简介:郑有贵(1963—),男,四川广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3]。我国持续探索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改革开放前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实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保障全面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在推进市场改革进程中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国家宏观调控等促进全面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辩证地把全面性与重点性统一起来,既推进重点,又着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形成了促进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路径。

一、基于人的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4]。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和目的,要为人的现代化提供条件和基础。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3]。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在不同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但都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基于人的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探索形成了实现路径。

(一)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首先是从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组织,是1927年11月成立的湘赣边界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就把政权组织的人民性显著地标注在政府的名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民也实现了翻身解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在政府名称上加了人民这个前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次大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做出部署,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路径,使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有了更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把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赶世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民不聊生的历史基础上起步的。中国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世界工业化发展步伐,既要改善民生,又要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难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统筹全局与局部、长远与近期的发展关系,致力于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上找到平衡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着力政权巩固、社会稳定、财经秩序整顿、国民经济恢复,让人民休养生息,民生得到改善。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之后,中国共产党抓住苏联对我国进行技术援助的时机,启动了以156个重大工程项目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促进国家工业化。即便是为追赶世界工业化步伐快速积累资本,也要注重改善民生。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才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5]。毛泽东、周恩来十分强调实行“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方针。1956年11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指出: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

几个月常说,我们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6]。在追赶世界工业化步伐的进程中,我国所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将资源向工业化进行倾斜配置,但也存在政府投资饥渴问题,加之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影响,“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方针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落实,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较短时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之相比,民生改善则相对滞后。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29 年建立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取向。这次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7]。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改革开放前奠定的物质技术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切实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新性地明确了“小康”“全面小康”的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并将其明确到“三步走”发展战略,切实推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三)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保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还有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需要。新时代我国遵循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要求,以物质财富增长为基础,促进五大文明全面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了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协调推进,促进了现代化的全面演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协调起来,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保障系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在产业体系现代化演进中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命题,党的二十大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进一步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我国坚持致力于产业协调发展,为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历史基础。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发展步伐,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演进,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由集中力量发展实体经济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同发展转变。这一结构性演进的实现,源于中国共产党统筹先导产业的发展引领、基础产业的夯实、产业门类的齐备发展,在构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程中夯实农业基础。随着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国家注重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进而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加之与人口大国及与之对应的消费大国等因素共同作用,使我国成为韧性强的经济体。

(一)在构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程中夯实农业基础

促进工农协调发展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工业快速增长和农业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的运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在推进国家工业化战略进程中,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在经济建设中以国家工业化为主攻课题,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促进工农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工农联盟和致力于缩小工农差别。自“一五”计划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起,我国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注重促进工农协调发展。其显著标志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认识,并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以苏联为鉴,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基于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深刻认识,1960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之后,党中央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60年8月10日,经毛泽

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经济越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越需要加强。邓小平指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8]。江泽民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9]。2003年1月8日，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无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会变。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需求结构会发生新的变化，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品种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如果农业的发展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出大问题^[10]。

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产业演进规律出发，在构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程中夯实农业基础，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农协调发展。

1.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工农协调发展。其中，特别注重运用资金投入和土地使用政策，守住农业基本盘，将其作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在资金投入方面，国家根据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采取相应政策。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工农、城乡发展有两个普遍趋向，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11]。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尽管如此，仍然对农业实行必要支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辩证地指出，重工业是投资的重点，也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5](P25)}。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基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将农业养育工业政策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支持农业发展。进入新时代，通过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加大惠农资金投入力度，大幅度提升对农业的支持水平，为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受弱质性困扰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土地使用方面，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并实行耕地红线制度。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水等资源配置普遍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国家从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出发，在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同时，确保耕地面积不突破红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强调，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4](P662)}；实施藏粮于地战略，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

2. 发挥工业化的先导作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力发展农用工业，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工业革命以来，农业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和引领的。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5](P200)}。1959年6~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强调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综合平衡问题，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12]。1975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发展工业问题时明确指出，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8](P28)}。1992年12月，江泽民指出：“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部门，还是其他部门，都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同一致，大力支援农业，真心实意为农民服务，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坚决反对一切损农、伤农、坑农的行为”^[13]。我国自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以来，统筹工农两大部门的发展，在发展基础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用工业、农业科技装备。在农业基础设施上大力组织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以提升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在推进技术进步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以科技提升农业。早在农垦事业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中，有一条就是建

立农业产业军,所以要开垦荒地,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14]。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5]。毛泽东关于积极推进农业技术改造的思想,是20世纪80年代科教兴农战略形成的思想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对农业技术改造和机械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精辟的论断,如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重视推进农业机械化问题。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6]。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将机械化列为农业工厂化的主要内容,指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17]。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66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对到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任务进行了部署。此后,又于1971年8月、1978年1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杂交稻研制成功,就是主动实施全国协同攻关的结果。新时代,我国实行藏粮于技,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实施激励政策促进农业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为农民谋幸福出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改革开放,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进入新时代,我国在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上采取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一系列举措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二是在2017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做出部署。三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四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五是针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农村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短板问题,明确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工业与农业关联度的提升,走出了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联结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农业农村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工农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我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重自然灾害影响,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7万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为应变局、开新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持续增长,2019年提前1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2021年达到18931元,比2012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实际增长7.3%,比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6.6%高0.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2年的2.88:1缩小到2021年的2.5:1。

(二)在发展虚拟经济时,发挥其服务作用、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18]。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演进中，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虚拟经济服务作用，防止虚热实伤，注重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同发展。

振兴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基于历史基础、国情和构建发展优势的选择。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19]。

把政策基点放在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着力解决实践中实体经济面临困境，坚决防止脱实向虚和虚热实伤现象的发生。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20]。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同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是相匹配的。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供给结构很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结果是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不足。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因为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监督人员同“金融大鳄”内外勾结，股市异常波动就与此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同了。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带动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进一步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导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19](P113-114)}。这“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强调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有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19](P114-115)}。

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出发，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原则，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自2015年8月26日起，人民银行实施降息及“普降+定向”降准的“双降”组合措施，促进社会融资成本降低。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共1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长期资金10.3万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8~2021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平均增速为9%，与同期名义GDP8.3%平均增速大致相当。人民银行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

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小微、“三农”、绿色发展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22年1月底,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19.7万亿元,为2018年年初的2.4倍;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4813万户,是2018年年底的2.3倍。普惠小微贷款增量在各项贷款增量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7.7%大幅提升至2021年的20.7%。2021年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3%,比2020年下降0.22个百分点,比2018年下降1.38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利率从2019年7月的5.32%降至2022年1月的4.5%,累计降幅达0.82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①。

三、基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致力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下区域发展分化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致力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针对“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的问题,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3]。

(一)在城镇化进程中致力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城乡差别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21]。1952年11月,我国在即将启动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鉴于中央、中央局、分局和省委的领导重心要放在城市工业建设上,为了不减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建立农村工作部。这就从组织机构和工作布局上对城乡兼顾予以了保障。国家从保障工业化的低成本推进出发,选择把农业人口留在农村及相应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到1978年的较长时期内城镇化处于徘徊状态,没有与工业化同步,城乡二元结构固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基于国际形势由冷战到和平发展的转变、国内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道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路径。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时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2]。在改革政策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随之迅速发展,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步入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进发展格局,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由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注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乡差距的问题。2001年,江泽民提出逐步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23]。自党的十六大起,国家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明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11](P248)},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着力补齐全面小康社会“三农”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短板。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判断: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4](P50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2020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习近平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4]。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探索形成,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人才下乡、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我国探索出了城乡协调发展之路。2012~2021年,城镇化率由53.1%上升到了64.7%,朝着城乡共同繁荣方向迈进。

(二)应对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统筹区域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全国一盘棋,着力均衡布局区域生产力,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持续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方式。

我国自“一五”计划启动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就明确了生产力区域均衡布局的思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作为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我国自实施“一五”计划起到改革开放前,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进程中,所实施的156项重大工程和三线建设两个大规模工业建设计划,是在国际上的冷战环境和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鉴于此,当时从生产力区域均衡布局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统筹考虑,向中西部地区布局工业生产力。这一生产力区域布局的实施,缓解了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水平区域均衡中的低效问题,从提高经济效益出发,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实施“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8](P152)}。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22](P155)}。这一区域发展思想的形成改变了各区域同步富裕的政策思路。基于这一新的区域发展思路,国家从战略上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并基于不同地带的资源条件、经济基础等安排投资项目。其中,对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吸引外资、更多放活政策和给予财税优惠等先富政策,以促进东部地区发展和发挥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到1988年9月,在改革开放初期积累实践经验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22](P277-278)}。在实施东部地区先富政策和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下,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1980~1991年,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总产值的比例,中部地区由68%下降到45.4%,西部地区由52.7%下降到23.9%^[25]。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针对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开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9条重要方针之一。《建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地区发展得快一些,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各地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从战略上看,沿

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建议》还提出,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总体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跨省(区、市)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在世纪之交,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开启了以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宣布:“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6]。8天后,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进一步提出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7]。同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提出要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00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通知》明确了国家重点支持西部地区的政策措施。

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养和用好各类人才。国家要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中部地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东部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农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国家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包括统筹区域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在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方面,明确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尽管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受市场机制下循环积累因果效应影响,我国经济总量和生产布局仍不断向东部地区集中。

新时代,我国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习近平强调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28]。党的二十大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新的部署。这次大会提出: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制定并扎实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明显。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7%、8.7%、8.4%,都高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的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全国水平。2021年,中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9.2%,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4%,分别比全国高出0.1和0.3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优势互补性持续增强。一是培育形成了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京津冀地区紧紧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推动区域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迈出新步伐,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长三角创新发展活力持续增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再结硕果。二是逐步走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区域发展道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稳步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黄河流域防洪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黄河干流连续20多年不断流。三是推动构建了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承载能力增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迈出新的步伐^②。

综上所述,我国在促进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从人的现代化发展出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产业体系现代化演进中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在构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程中夯实农业基础,在发展经济中发挥虚拟经济服务作用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在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固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动态地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演进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全面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是我国成为韧性强的经济体、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相互促进的重要因素,是我国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支点和优势。

注释:

①《央行:稳健货币政策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有力支持实体经济》,中国经济网,2022年3月1日,http://bgimg.ce.cn/xwzx/gnsz/gdxw/202203/01/t20220301_37365782.shtml.

②陆娅楠:《经济发展大提高 生态环境大改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人民日报》,2022年5月13日,第4版。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92.
-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07-28(1).
-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4).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
- [6]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30.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7.
-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
- [9]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44.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14.
- [11]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7.

-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8.
- [13]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5.
- [14] 农业部政策研究会.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1995:222.
- [15]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8.
-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
-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15.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795.
- [1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16.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77.
- [2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27.
-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 [23]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07.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95.
- [25] 刘再兴.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55.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855.
- [27]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0.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71.

The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ENG Youg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CPC in promot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combine the comprehensive and key unity, both to promote the focus,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people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the modern industry system evolution, build independent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nd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hile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develop virtual economy entities to consolidat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mong the 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l effect solidifies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forming a path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o dynamically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to broaden the space in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o enhance the stamina of development in strengthening weak area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China to become a resilient economic entity, for both long-term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to promote each other. It is China's fulcrum and advantage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changes and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Social Coordination;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i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陈敦贤)